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发表

陈积敏 张高胜

新中国外交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和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也就是“上海公报”，从此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帷幕。

来之不易的“破冰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奉行对华敌对政策，导致中美之间经历了二十二年的对抗和相互隔绝状态。然而，两国领导人均认识到，这样的状态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持续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中美两国都感到缓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向国会递交的第一份外交报告中明确表示将“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关系”。美国国务院放松了前往中国旅游的大部分官方限制并进一步放宽了贸易管制。10月26日，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访美的宴会上首次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中国在密切关注美国政策动向的同时，也在向美方发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息。1970年7月，中方释放因间谍罪被捕并被判刑的美国天主教主教教华理柱。毛泽东主席还通过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之间的谈话来传递信息。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无论是作为旅游者还是总统来都好，同时还

意味深长地讲道：“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而立的合影照片，并在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一栏中写下了“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中美间的良性互动终于在1971年4月获得了前期成果，中国邀请在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中美关系史上“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佳话。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经过巴基斯坦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与基辛格经过11个小时的紧张会谈，最终就尼克松访华达成一致意见。中美两国对外发布尼克松访华公告，举世震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前往迎接并同他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锚定航向的“上海公报”

尼克松访华是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标志性一步，但两国能否维持并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尚难预料，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在重大分歧面前寻找到共同点，并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与默契。这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而联合公报的起草则是这种考验的集中体现。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双方已就联合公报草案进行了数次讨论，历经多次反复。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着重就台湾、中南半岛、朝鲜、日本和南亚次大陆等重大双边与地区



周恩来设宴款待尼克松

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1972年1月，作为先遣组来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试图利用苏联对华威胁，迫使中国在重大问题上让步。中方对此进行了严正驳斥，坚持了原则立场，但同时采取了灵活性策略，确保了谈判的顺利进行。及至尼克松访华期间，谈判双方仍主要就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文字表述进行着激烈交锋。谈判组“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直到2月27日下午3时半，也就是公报发表前一天，双方才正式敲定公报内容。

“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同时强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并确定了双方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的政策方

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这一问题若处理不好，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就无从谈起。“上海公报”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虽未尽一致，但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即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在公报中明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方在公报中也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于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重大分歧问题上，中美找到了一个认可与接受的基本共同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则建立了高度的政治共识，即“反霸”共识。“上海公报”明确写道：“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上海公报”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精神，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这一历史性文件载明了中美双方愿意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原则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昭示未来的历史经验

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中美关系也经历着新的考验。50年前，中美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美应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价值体系不同的国家，双方存在矛盾与分歧在所难免。中美间的分歧与矛盾不意味着两国要走向对抗与冲突。正如周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晚宴上所表示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持续推进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中美关系的基本事实。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之前，两国处于敌对与隔绝的状态，双方均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安全压力与经济损失。正常化进程开启之后，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双方在经贸、科技、人员交流等领域展开了全面互动，这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体现出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2021年增加到7556亿美元，增长约300倍。

人力资本积聚助推科技创新

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基础。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驱动力量，科技创新能够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者素质的大跃迁，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由科技创新推动形成的。科技创新必须以人为载体，其本质就是人为了解决自然和社会问题而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与对人力资本的知识输出密切相关。当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在某个地区积累起来时，就形成人力资本的集聚，这势必推动该地区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储备是推动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以知识技能、技术水平、主观能动性、健康状况为基本形态的资本。从微观个体来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程度越高，学习能力就会越强，越有可能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获得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但是人力资本不是天然形成的，劳动者需要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进行技术创新所必需的知识基础、技能水平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这些积累主要通过书籍和知识的普及获得。

所以，1500—1800年间欧洲之所以发生经济增长的小分流，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知识传播和普及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正如1803年法国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评论说：“英国拥有巨大的财富，这更多地归功于它的工人非常优秀，并且冒险家拥有不可思议的实际技能，能够有效地利用知识，而并非科学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当然它在这一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知识信息广泛传播使人们的读写能力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于是在区域内形成人力资本的集聚。欧洲北海和不列颠地区的劳动者比其他区域更懂技术，故而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



知识普及与欧洲经济增长小分流

徐浩然 石晓婷

16至19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经济的小分流，主要表现为欧洲普遍的经济增长态势发生改变，经济重心越来越向西北欧集中，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经济社会基础。这次小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的出版发行量骤增，知识的普及推动了欧洲北海和不列颠地区生产条件的转型升级。当优质的人力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于是这些地区能够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经济增长在公元1500—1800年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欧洲经济增长小分流

在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不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其城市化水平和人口数量都低于同时期宋朝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落后的技术、较低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水平以及大量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是这一时期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这种情况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才有所改变。公元950—1300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增长趋势，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地区的人口增长了100%—150%，一些低地国家和英国的人口增长则达到了300%左右。同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也实现了巨大的跃迁。11—15世纪除伊比利亚地区外，许多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荷兰等，城市化水平都普遍提高。这表明，欧洲已经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逐渐演化为生机勃勃的增长和创新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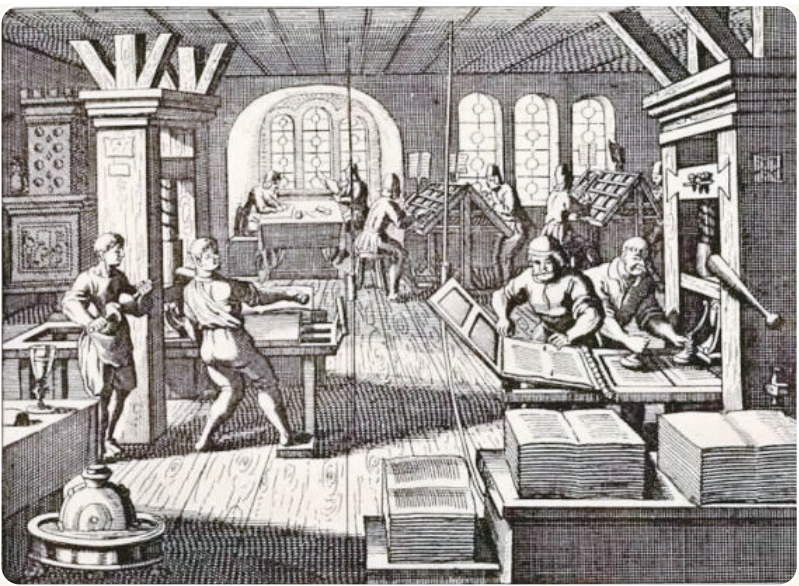
这种普遍繁荣持续了大约4个世纪之后，公元1500年—1800年之间，欧洲的经济增长发生了一次小分流，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全域性转变为北海地区和不列颠群岛的区域性增长。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的人均GDP在1500—1750年间出现了明显下降，1750年之后才出现小幅回升。与欧洲南部和东部国家的经济停滞相比，北海地区国家的GDP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甚至一些国家增长十分迅速，例如荷兰增长了50%，英国的人均GDP则在1600—1820年间翻了一番。这一时期人们实际工资的变化也能很好地印证小分流的趋势。15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的实际工资水平普遍很高，地区间实际工资的差异比较小。15世纪下半叶之后，安特卫普、阿姆斯

特丹、伦敦等北海地区国家的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黑死病”疫情之后的状态，其他国家的实际工资却出现了长期下降，直到18世纪后期才结束。因此，在1500—1800年间，欧洲低地国家和不列颠群岛附近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更有活力。16世纪时，欧洲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荷兰南部，到了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

古腾堡印刷术推动了知识普及

欧洲经济增长的小分流为什么会发生在16—19世纪呢？这与当时书籍大范围使用带来的知识普及有关。经济增长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其基础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要实现这种增长，劳动者的知识积累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知识基础的劳动者才能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创造新知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书籍则是储存和传播知识最好的“硬件”。

中世纪时，欧洲用来传播知识的主要是晦涩难懂的拉丁语，能读懂这些语言的人很少。再加上当时的书籍基本都是手写本，价格相对较高，因此，只有宗教成员、贵族等能够接触到书籍。14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这场极为凶险、传播非常迅猛的瘟疫夺走了欧洲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在这场大瘟疫中，贵族和教士也没有避免，使用拉丁语的



古腾堡印刷术在欧洲被广泛应用

人数随之减少。随后，语法和发音都相对简单的英语取代拉丁语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人们阅读书籍清除了语言障碍。

“黑死病”之后，欧洲的农场主和工厂主逐渐意识到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才是应对劳动力人口锐减、劳动者工资提高的最好办法。由此，技术革新逐渐成为14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国家的主流。在港口城市出现了人力或者马拉的起重机，风车在那些缺乏水能、地势较低的地区也出现了，船舶由过去的完全依靠人力变成了依靠风能。总之，各领域都需要高技能的工人，要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进行技术革新，一方面需要实践经验

的积累，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书籍阅读了解世界各地的技术发展情况。同时，“黑死病”造成的大量人口锐减还间接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增加使这些劳动者有更多闲钱去购买、阅读书籍。

语言障碍的清除、收入的增加以及提高技能水平的需要，使人们对于书籍的需求快速增长，书籍市场迅速扩大。但是当时流行的书籍仍然是手写本，生产效率较低且价格较高，书籍的普及率依然很低。

为了解决书籍生产的瓶颈问题，古腾堡在1440年代和1450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古腾堡1400年出生于德国的一座工商城市——美因兹，他的父亲在造币厂工作。受

父亲职业的影响，古腾堡年幼时曾学习过金匠工艺，在年轻时就做过金属活字实验，但是没有成功。1444—1448年间，古腾堡到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进行技术考察。1448年回到家乡美因兹后，古腾堡向本地的富商贷了一笔款，继续进行活字试验。这次试验很快就取得了技术性突破，到1450年时金属活字已处于实用阶段。

古腾堡用铅合金铸成活字，这种合金熔点低、密度大，即使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也能浇铸活字，便于活字大量生产。同时，他还用油性调墨制成了适于金属活字的印刷油墨，创造了以字母为活字排版，来适应拼音文字的需要。古腾堡的这些首创性发明解决了在他之前的活字印刷存在的弊端，更加适合欧洲印刷生产的需要。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书籍的出版速度史无前例地加快。公元1400年一个人抄写一本书要100天，而到公元1500年一个人一天能印刷100本书。同时，书籍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也不断下降。在古腾堡印刷术产生后的20年间，书本的价格同过去的手抄本相比大幅下降。书籍成为大部分人都能够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这在学徒工中间尤为明显，欧洲学徒学习一项技术过去主要通过师傅的口头相传或者亲身示范。大量书籍出版发行后，学徒工可以直接通过书本中的知识来学习相关技术，而不再受限于师傅的教授，从而减少了培训费用，增加了高技术工人的质量和数量。